

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社会

蒋建农 唐洲雁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社会

蒋建农 唐洲雁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 07 号

Zhishi Fenzi yu Dangdai Zhongguo Shehui
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社会

蒋建农 唐洲雁 著

责任编辑:宋一夫 孙洪军

封面设计:李岩冰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4 插页 25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长春市兴华印刷厂印刷 印数:1-3 000 册 定价:15.80 元

ISBN 7-80626-224-5/K·95

目 录

序 篇 通向革命之路·····	1
第一篇 双重使命 (1949~1956)·····	18
一、共和国在召唤·····	19
第一次归国热潮(20)	
共和国的礼遇(22)	
开国参政(26)	
二、“团结、教育、改造”三步曲·····	29
建设与团结(29)	
自我教育与自我改造(35)	
思想改造运动(43)	
三、文化建设与思想批判的变奏·····	52
培养工农知识分子(53)	
文化建设的开端(57)	
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64)	
胡风事件(72)	
四、新角色的认同·····	78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78)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88)	
本篇结语·····	93
第二篇 主题转换 (1957~1966)·····	97
一、知识之春·····	98
放眼世界(98)	
推陈出新(101)	

	春意盎然(103)	
二、	“苦夏”	106
	整风伊始(106)	
	反右扩大化(112)	
	苦果(118)	
三、	文化“大跃进”	125
	向党交心(125)	
	不断革命(128)	
	破除科学迷信(134)	
四、	调整与反思	138
	纠偏(138)	
	来自思想界的反思(141)	
	从纠“左”到反右(146)	
	重归1956年(151)	
五、	“文革”序曲	160
	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160)	
	批判党内知识分子(163)	
	揭开“文革”序幕(167)	
	本篇结语	171
第三篇	“继续革命”	176
一、	在“教育革命”的幌子下	177
	“教育要革命”(178)	
	工作组之争(181)	
	园丁之歿(184)	
	红卫兵的崛起(189)	
	两代人的悲剧(195)	
二、	“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204	
	第一次冲击波之后(204)	

“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207)	
清理阶级队伍(212)	
三、“再生”之路	218
“知识分子革命化的必由之路”(219)	
炼狱煎熬(228)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235)	
羔羊迷途(242)	
四、文化专制淫威下的知识分子	251
文化专制的肆虐(251)	
心理扭曲(259)	
民族的脊梁(262)	
第四篇 走出误区	269
一、人民胜利了!	271
真理的呐喊(271)	
决战时分(283)	
二、乍暖还寒	288
劫后心声(288)	
沉重的起步(293)	
春寒料峭(296)	
三、春雷第一声	302
教育界的躁动(302)	
思想解放的先声(304)	
“先行官”先行(307)	
科学的春天(313)	
四、告别误区 走向未来	316
不负历史的重托(317)	
春风化雨(323)	
结 语	335

序 篇 通向革命之路

如果从孔夫子算起，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至少已经延续了2500多年。这是一条漫长的历史道路，它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传统的中国学人，也给我们今天留下了庞大的心理积淀。

也许要归功于孔子时代百家争鸣的竞争环境，“学而优则仕”一开始就成为传统士人崇奉的信条。应君王、作辅弼、为人师，……由士而仕，日渐成为那些四处游说的儒子们的价值取向。当年樊迟曾向孔子请教“学稼”、“学为圃”之道，不想立即被恩师无情地斥之为“小人”。如此耳提面命，言传身教，自然使儒学一脉“英才”辈出，长盛不衰。孟子后来心领神会地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①，并自夸“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②可以说，自孔孟之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已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人格理想。

汉武帝以后，为了铸就封建大一统所需要的依附人格，独尊儒术，废黜百家；重文士，轻武夫，并由董仲舒参与、构建了一个集政治与教育于一身的“士——官僚”体制，作为专制皇权的行政支柱，从而也进一步将孔孟以来的“学而优则仕”的理想付诸现实。

到了隋唐，“学而优则仕”的人格理想被进一步制度化为一科举取士。为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官府不惜以高官厚禄利诱之，从而在传统知识分子中间形成唯有登科入仕方为正途的价值观。有多少传统学人，孜孜以求于这条狭窄而又漫长的仕途上，乐此不疲，死而后已，发展到极致，便有了清人吴敬梓笔下范进中举的种种情状。

无可否认，科举取士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

① 《孟子·滕文公下》。

② 《孟子·公孙丑下》。

繁荣昌盛，与西方中世纪的神学禁锢相比，它无疑使东方文明有了充分发挥的余地。它的制度化，使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较其他阶层有更多的机会活跃于社会的政治舞台上，对社会弊病和危机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切的感受力，再加上他们独有的知识优势，能够较其他阶层更早更远地预见历史的发展趋势，因此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摆在民族先知先觉者的地位，以“社会良心”自居，勇敢地承担起“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的历史使命，培养出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

“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对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具有形上的超乎个体的本体意义，它要求一代又一代的传统学人们要以民族的、国家的乃至王朝的群体利益为重，在必要的时候不惜牺牲自我，泯灭个体。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以群体为本位的历史使命感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悲壮的救世精神，却也酿造了一幕又一幕扭曲人性、扼杀个体的历史悲剧。许多朝代，一方面是士大夫阶层不断的奔走呼号、为民请命，另一方面却是焚书坑儒乃至连年不断的文字狱。这就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悲剧性特征。

就在中国科举制度鼎盛，知识分子热衷于仕途，不断地将“修齐治平”的人格理想转化为现实的时候，西方知识分子却在奋力从经院神学中挣扎出来，将自古希腊以来形成的爱智求真的传统与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大批敢于为真理和科学而献身的新型知识分子，有力地推动了西方社会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可以说，近代资本主义列强的兴盛，无不与这批新型知识分子的崛起有关。

随着文明与野蛮在近代东西方的历史性转换，中国长期闭塞的国门终于洞开，先是“师夷其技以致夷”，接着又有了

“中体西用”乃至“全盘西化”之声。社会分工有了一定的发展，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也有限度地获得了自己的专业活动和独立意识。特别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寿终正寝，宣告了单一发展渠道的终结，中国知识分子也逐渐领悟到了作学者区别于作官吏的自我价值，开始了新的角色认同。社会上出现了以报人、出版商、工程师为职业的学者文人，他们不再禁锢于一家一说的狭小圈子，而是开始按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去选择职业，有限度地获取了人格独立的精神前提。

然而这种人格精神离不开也摆不脱政治而独立，相反只能在政治独立的前提下存在。国势衰微，民不聊生的现实强化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他们不得不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公车上书、变法革命，活跃于救亡的历史舞台。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康梁到孙黄，无不有着这样一些坎坷的历程。

五四运动在塑造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从根本上否定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知识分子的道路，解除了封建道德文化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桎梏，开创了科学与民主的新风气。它的影响，大大地突破了近代中国历史上历次思想文化运动的影响范围，不仅在知识界，而且在国民心理中造成了极大的震撼。五四运动之后，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和行为大大解放。他们追求独立人格，赞美自我奋斗，向往西方文明，努力冲决各种传统罗网，摆脱那种“父兄养子弟、子弟靠父兄”式的“寄生的生活”，以达到“自立”目的的最佳选择。^①一些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则纷纷出国勤工俭学、“以工助读”。周恩来在描述当年的“出国热”时曾说：“迨欧战即停，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

^① 《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70页。

作海外勤工俭学之行者因此大增。”^①

然而就在中国人终于放下了久放不下的架子，以学生的身分热情地向西方老师学习的时候，历史却无情地演出了一场先生欺负学生的历史悲剧，使那些虔诚的学生在思想上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当然这种二难心境不可能无限期地延续，因为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在知识分子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不能不影响到他们对中西文化的进一步选择。在他们看来，国势危如累卵，人心又是如此离散，这难道不是文化上的不能一统所造成的么？因此，迅速弥合五四以来的文化混乱，确立起全民族的共同信仰，成为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呼之欲出的强烈心愿。他们看到了国难深重，急迫需要高扬爱国主义精神，而爱国热情并非凭空产生，它需要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作为文化背景。于是便有人提出：“所谓全盘承受，究竟承受的是什么？是承受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盘，是承受社会主义文化的全盘，还是承受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两者的全盘？”^②由于不同的阶级背景、理想追求和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使五四新文化阵营的内部开始发生了分化。以胡适为代表的一翼，主张以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为蓝本，通过建立“好人政府”来进行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要求国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强烈反对过激的社会革命。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是没有用处的”^③。在胡适的这种思想影响下，一些知识分子一方面在思想领域继

① 《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之大波瀾》，见天津《益世报》1921年5月15日。

② 王新命：《我们的总答复》，《文化建设》第1卷，第8期。

③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

续从事科学、文化和教育等工作的研究，另一方面则在实践中开展对诸如“大总统的权限”、人力车夫、卖淫等问题的研究，将希望寄托在能建立起一个“好人政府”来。但是，在国难深重的历史条件下，这条道路显然是走不通的。他们在现实中对整个社会状况的改变起不了什么重要的影响，在学术领域也只能越来越走入整理国故一类的狭窄胡同。

在新文化阵营中，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翼，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蓝本，通过发动民众，开展激烈的阶级斗争，来达到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根本解决”。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解决一切根本问题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它不仅适合中国的国情，而且也与当时高扬爱国主义的战斗精神，呼唤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建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世界的国民心态相吻合，自然地成为比主张进行一点一滴社会改良的实用主义更富有吸引力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迅速传播，除了它本身的科学性和当时国内形势的迫切需要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给中国知识分子以某种心理上的导向。因为当年的中国知识分子更多地是通过俄国的渠道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对中国现实斗争道路的选择，自然地不是走俄国孟什维克派的和平道路，而是走布尔什维克党的暴力革命道路；他们所接受和理解的唯物史观，也总是与激烈的阶级斗争紧密相联的。毛泽东曾经这样来总结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程：“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

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①

以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一大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立即运用来指导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毛泽东曾经肯定地说：“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②“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什么叫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队伍。这支军队是相当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几百万。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③

无可否认，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的初期，其作用是巨大的，他们扮演了革命的启蒙者、宣传者和组织者的角色。没有他们的鼓动宣传，中国的民众难以发动和组织起来，革命的热情也不会上升到科学的理论高度。据统计，1925年的中共党员约900余人，其中知识分子特别是在领导岗位上的知识分子比例甚高。他们一方面从组织上发动和领导工人、农民参加革命活动，另一方面又从政治、思想和文化上对工人、农民施以培养和教育。实际上，从毛泽东在当时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等一系列实践活动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革命先锋作用。

然而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的结合，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① 《关于农村调查》，1978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46页。

③ 同上，第553页。

这是因为知识分子虽然是革命中“最早觉悟的成分”，虽然是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但是革命“光靠这个方面军还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①因此，毛泽东号召：“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②他强调：“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③

中国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农民革命。这一实质，经过了多少曲折艰难，才在毛泽东那里加以认识。为了这场农民革命，多少知识分子经历了脱胎换骨的身心改造。这是因为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作风、习俗、文化知识上的种种差别，要吸收、教育工农参加革命，知识分子当然就不可能高高在上，而必须努力去向工农接近、靠拢，主动缩小生活作风和习惯上的差别，消除相互间心理上的隔阂。在与工农大众的长期接触中，知识分子日渐发现自己身上的不足和缺点。他们那种由于经济地位的优越而造成的养尊处优、弱不禁风，由于思想环境造成的多愁善感、无病呻吟，由于阶级地位造成的左右摇摆、举棋不定，都会与工农大众格格不入。因此要真正发动工农，实现自己的工农化、大众化，知识分子就必须狠下决心革除自己的那些痼疾，实现对工农群众的“情感转移”。这是当初每一个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建立的自我意识。毛泽东曾经这样来描绘自己实现对工农群众情感转移的亲身体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53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546页。

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①毛泽东认为，“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②

实际上，随着大批知识分子走进农村、投身革命，革命也必然会使他们的情感方式发生急剧的变革。他们深深地感知着革命中严明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高超的领导艺术，而内心里却又常常留恋着过去长期生活所养成的多愁善感、自由散漫、优雅恬静的情感方式。这就使他们不同程度地都陷入了彷徨、痛苦和自责之中。瞿秋白曾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无产阶级“异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感、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他在《多余的话》中认为自己本来是爱好文学的人，是个“半吊子文人”，由于历史的纠葛而参加政治运动，“勉强做着政治工作”，就性格、才能、学识而言，担任共产党的领导人实在不合适，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在残酷的阶级斗争和复杂的党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53页。

^② 同上。

内斗争中，他深深地感到自己的力不胜任，心里已经极度地疲乏；深深地感到自己虽然向往过革命、参加过革命、领导过革命，但临终也不过是一个“中国的多余的人”。这种发自内心的自白，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确有一定的代表性。它深刻而又真实地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在带着火一般的热情和信念去急迫地追寻人民，追寻革命的过程中，往往又恋恋不舍于过去那种高级文化所培养出来的敏感、脆弱、纤细、复杂的情感，陷于一种二律背反式的内心矛盾之中。

知识分子还由于常年浸淫于书斋，造成对实践知识的缺乏，因此在革命的实践中，还往往容易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土地革命战争以来，党内连续出现过几次左倾机会主义，都与当时几位知识分子出身的主要领导人的缺点不无联系。他们片面强调马列主义的“本本”，反对中国实际的斗争经验，认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严重地影响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形象。毛泽东曾不得不花大力气与这种“吃过洋面包”的教条主义者进行反复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并通过后来的延安整风运动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胜利。

在延安时期，党内除了有像王明那样从苏联回来的所谓“大理论家”、“大知识分子”外，还有许多从敌占区的层层封锁线里闯过来的知识青年、进步文人。这些人的到来，一方面带来了新的血液、新鲜的空气，使人耳目一新；另一方面，他们在价值观念、生活情趣、个人爱好乃至语言谈吐上又与工农干部有所隔阂。对于这些青年学生、进步文人，既要保护他们政治上的积极性，吸收他们有益的文化知识，但又必须对他们从思想上、情感上加以正确的引导。而延安整风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则是这种引导的一次尝试。

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曾就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间的结合问题进行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世界上“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①；“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必须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必须使两种人互相结合。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②毛泽东的这些论述，科学地阐明了知识分子的书本知识和工农干部的实践经验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知识分子大众化和工农干部知识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紧接着延安整风的几篇纲领性文件之后，毛泽东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了两次经典性的讲话，突出强调了国统区与根据地文艺工作者及其服务对象之间的区别。他认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③因为他们对于这里的农民、士兵、干部不熟，不懂不熟自己的描写对象，不懂他们所运用的语言，因此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受到群众的欢迎，就必须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经历一个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过程。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20页。

② 同上，第850页。

③ 同上。